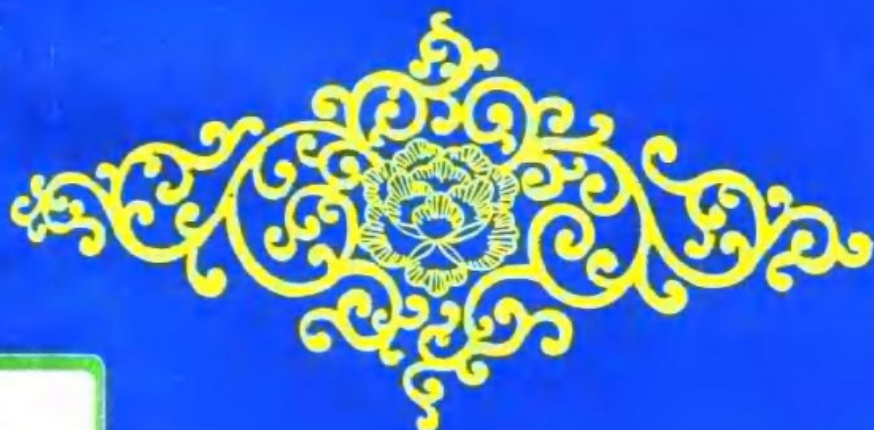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

西藏 六十年大事记

(民国)朱 绣 编著
吴 均 校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7.5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BA09/09

96
K297.5
26
2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民国)朱 绣 编著

吴 均 校注

C

353851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民国)朱 绣 编著

吴 均 校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375 插页:4 字数:110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5-01222-3/K·97 定价:6.00元

朱錦屏先生編

西藏六十年
大事記

09
邵振青題



錦屏先生

留心邊計

其易堂校題

邵序

西藏世人所稱爲秘密國者是也、雖爲中華五族之一部、然我國人能注意者却甚少焉、因朝野人士皆不甚重視西藏、於是英人遂得大逞其侵略陰謀、西藏之主權早已非我所全有矣、夫唇亡則齒寒、輔失則車覆、各國之重邊防、所以杜其漸也、况西藏爲我國西陲之寶庫、其天然物產、與夫歷史文明、皆足爲中華五族生色、英人得之、不啻斷我左臂、而迅致腹心之患、故言開發西北、鞏固邊防者、尤不可不先顧慮西藏之安危、朱君錦屏、乃今世奇才異能之士、與余爲刎頸之交、十年以來、堅苦卓絕、在海辦理教育、首注意於蒙藏問題、前年得一機會赴藏、藉以盡悉其秘密、復拯藏邊之警使、轉危而爲安、曾以詳細辦法、條陳於政府、惜彼時肉食者流、笑爲迂闊、高閣置之、僅以官拯文章傳令嘉獎而已、朱君志不得伸、

題詞

題朱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記後

滄桑屢變更、怪象時爲呈、大雅渺如煙、審爲世網嬰、尋常章句學、等諸候蟲鳴、著述非不富、事業無所成、崑崙河海間、遙遙徒聞名、最近六十年、誰歟擇其精、朱君人中英、厥號曰錦屏、今復參國政、幼卽居邊城、軀膽兩雄偉、心胸素崢嶸、辛勤復辛苦、全藏賦西征、論及國家事、夙夜謀經營、將以保青海、藉以福蒼生、曲高和者寡、志大艱於行、迺猶筆諸手、讀罷令人驚、杜牧罪言書、賈生痛哭聲、王朴安邊策、君皆與之并、我亦客燕京、君來倒屣迎、示我篋中書、豈伊紙上兵、搜求兩朝史、醫治衆目盲、古往今宜鑑、否極時乃亨、是爲救國策、竊效野人賡、句乏瓊瑤報、思將肺腑傾、求信蠖蟄暫屈、訂內虎紛爭、烈烈邊風急、娟娟夜月明、與君談舊事、掩卷淚縱橫、

民國十四年清和月鎮原慕壽祺少堂甫題於都門廨所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出 版 说 明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由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规划整理，由青海人民（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互相交往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它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军事、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从未被系统地整理过。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左”的思想干扰，损失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而把整理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上述精神，抢救青海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使广大人民了解和研究青海，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出版的

方式，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以《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的形式，陆续奉献给大家。

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懂，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点、分段、注释、繁体字改简化字、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文）等整理工作，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正和说明。本丛书一律采取横排，并以辑录、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作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粕并存，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为主，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市、区协作规划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在青海历史上属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1994年12月25日

绪 言

我们伟大祖国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的西藏地方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藏族主要聚居区之一。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兄弟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各兄弟民族共同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巩固和发展，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藏族文化是祖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宝库中光芒四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显著地位。

19世纪后期，清朝中央政权已经十分腐朽，对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屈辱投降路线，其派在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昏庸无能，以致西藏地方在帝国主义的覬覦下发岌可危！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略中国西藏的隆吐山战役，从而正式揭开了侵略西藏的序幕。那些驻藏大臣颡顽无能，对外畏敌如虎，遇事规避，丧权辱国，而对内则狂妄自大，压迫人民，导致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利用他们占领印度的势力，趁中国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派在西藏地方的官员和军队破坏民族团结，胡作非为，致使清朝中央政府及其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之间矛盾激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

仇英转向亲英，给英帝国主义破坏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实施分裂阴谋以可乘之机。它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培养亲英分子，支持军火财物，企图使西藏地方从中国分割出去，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它还制造西藏地方不属于中国的谎言，抛出所谓“宗主权”、“独立”、“自治”等等谬论，混淆国际视听！

民国以来，袁世凯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急于求得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授人以柄，竟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讹诈之下，同意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抛出所谓“内、外藏”划界议案，在全国一致声讨、反对声中，西姆拉会议制造的草约，不得不搁置而告吹，但它的幽灵，仍时时被英国拿出来舞弄。尤其是英国在会场以外，以扶持“西藏独立”，“赶走西康的川军”二事为诱饵，背着中国代表，威胁、利诱西藏的一些农奴主、亲英分子，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等秘密签订“麦克马洪边界线”，割占了中国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致成为今天中国、印度两国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袁世凯下台后，政潮迭起，川、滇军阀交恶，互不相容，四川内部更是攻伐不休。英国利用中国内部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号令不能顺利执行的时机，大肆鼓动和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活动，在江孜和印度积极培训藏军官兵，扩大其在西藏的势力，提供大批军械和金钱，策动向康区部署重兵，进行川藏战争。当驻守昌都的四川边军统领彭日升热衷于内讧，派部队东趋炉城（康定），加入军阀混战时，噶伦喇嘛降巴登达指挥的藏军已叩昌都之门，其结果则是边军缴械投降，藏军东渡金沙江，直抵雅砻江岸。由于英国直接插手，导演订定了所谓为期一年的

“川、藏停战协议”，致川、藏关系更形混乱。

在“五四”运动的震撼和全国舆论的督促下，北洋政府认识到必须恢复同西藏的直接联系，乃于民国八年（1919年）夏，指示甘肃省督派出以朱绣、李仲莲为首，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古朗仓、黄教喇嘛拉卜仓等组成的代表团前赴拉萨，进行联络。在政治风云极其微妙，从北京到拉萨，英帝国主义阴谋无所不用其极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排除各种干扰，撤怒江之防，派人迎接朱绣等于青藏边界，在拉萨与朱绣等晤面数次，在团结、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廓清过去的隔阂，共同磋商了未来的和平蓝图。我们看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校注者按：藏历土羊年的十二月，即公元1920年2月），接见从青海来拉萨敬献礼品的陕甘总督（校注者按：这是起居注记载者对甘肃省督军使用了清朝官制的称谓，同时应该注意记载者使用的“供施关系”口吻）的专使周修（校注者按：译者对音有误）和李仲林（校注者按：译者对音有误）二专员及宁玛派喇嘛古囊〔朗〕仓等人。上午，由政府的僧俗接头人、译师、堪穹等人把汉族官员领到车德林卡，之后，一同来到侍卫军营西面。达赖喇嘛即刻下榻侍卫军营寝室，并在这里接见他们，相互交换哈达，通过翻译详谈。”

“十四日（校注者按：藏历土羊年十二月十四日），再次接见陕甘总督专使，相互磋商许久。”

“三月（校注者按：藏历铁猴年三月，公元1920年4月），出席埋葬养地宝瓶和修供时轮法会，抛撒驱魔朵玛后，设茶宴为……陕甘总督主仆一行等人（校注者按：译文在“主仆”前似掉了“专使”二字）话别送行。”

当朱绣等圆满完成“直接联系”的任务，于1920年4月上旬携带达赖亲交的汉藏合璧正式公文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派人送来的藏文公文，以及他们分别致送的礼物等返回甘肃时，正值北洋政府处于直皖内战之后，政潮不息，毫无作为，秉国政的那些军阀政客们对达赖“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的企求，毫无反响。然而时代终于前进，“那种想把西藏问题再拉回西姆拉会议桌上的图谋，显然只能是一场徒劳”（见《藏族简史》第379页）。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急先锋查理斯·柏尔不得不在其《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1920年1月半间，中国使者（校注者按：指朱绣等）经西藏东部之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月后，仍于1920年4月离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之影响渐大……，中国使者已设法腐化西藏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是朱绣从西藏回来后，悲愤当政者目光短浅，放弃大好时机，贻误边疆大计，不重视民族团结的愤愤有为之作。书中以爱国主义的笔触，运用他实地考察所得的见闻及各种档案资料，并搜集各种有关条约，揭露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妄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的野心，和英帝国主义与沙皇俄国如何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图谋在我国领土内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抨击清朝驻藏官兵压迫人民，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及当时北洋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交涉中之昏庸无能，无知无识，辱国丧权的罪行；记述兄弟阋墙的川、藏前后战争和英帝国主义如何干涉我国内政，挑拨操纵的实况。这是一份向各族人民提供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资料。这本书的写作，朱绣得到了他的“刎颈之交”北京

京报社记者、进步人士邵飘萍的积极协助，并由京报社于1925年印刷出版，发行问世。有识之士，咸推为高瞻远瞩，忧世钩沉，翔实可靠，可鉴往而知今。六年后，西康驻军又重印于成都，作为藏事变迁原因之参考。

朱绣，字锦屏（？—1928年），青海湟源人，出身城市贫民，幼时曾作商店学徒，精通蒙、藏语，自学成才，为当时甘边政治活动家、民族教育家。自拉萨回来后，致力于汉、藏文化交流，于其主持的青海蒙番学校及筹边学校招收各族学生，聘请藏、汉、蒙古学者，教授汉、藏、蒙古文及边事，培养了一批服务于民族教育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人士。1928年，陇上风云幻变，河湟乱起，朱绣与陇上名士周务学等往返兰湟，奔走和平，不幸共同被宣称哗变的护送部队残害于乐都县老鸦峡！（详见《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第90页）壮志未酬，人莫不痛惜。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虽在北京、成都先后印行两次，为此后的藏学者提供了研究藏事之信史，既具古为今用之资，亦省寻觅之劳，各种有关著述，多有征引，但因印行时间过久，流传不广。朱绣的赴藏日记——《海藏纪行》一书，详述自湟源至拉萨沿途道程难易，史地沿革。1933年初，曾在南京刊于《新青海》杂志，是研究民国初期青海地区，特别是玉树地区与藏北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的实地记录，深受海内外藏学者重视，与周务学之《宁海纪行》相媲美。《海藏纪行》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位爱国主义者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同情藏族劳动人民的忧国忧民之心声。他为了沟通当时西藏上层与祖国联系，在道路崎岖、时遇风雪雷雨的旅途中，艰苦跋涉，困苦备尝，不折不挠，坚毅不拔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兹附录于《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之后。他另有《拉萨见闻录》一编，详述

在拉萨折冲时种种过程及西藏地方一些农奴主们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汉藏民族关系的分裂行径。20年代，曾作为青海筹边学校的边事教材。遗憾的是虽多方寻找，遍访知情人氏，终无所获，竟成《广陵散》矣！

本书根据1925年京报社版进行校注，并参照了成都版。由于时代的局限，著者思想和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糟粕，使用的词句和论断有某些不恰当的时代烙印，一些资料的征引、概括和叙述间有笔误和遗漏之处。校注时对极个别已予以扬弃，有的由于是历史资料，未加更动，分别加上注释、补遗、更正及辨析说明，以保存史料的原来面目；有些重要资料，如麦克马洪线等，本书编写时，尚未公诸于世，原文未载，故分别概括注入，以明事件的整个过程；有的事件，如北洋政府外交部歌电及各省反对的有关电文，朱氏未详加评述，兹分别纳入注中，以明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对国家疆域之无知无识；有些事件，朱氏仅简略述及或失载，据近来先后出版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等等分别予以注明。京报社版排印时，个别处排错先后次序及脱落年限等，兹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的加上年限和时间顺序，重新加以整理，有的则分别加注，作了说明。人名和地名译音前后不一者，尽量予以统一并加注说明，其按安多语或康语译出者未强求一致；对于达赖喇嘛晚年执行两面政策，企求恢复所谓“原来的供施关系”以及对刘曼卿的谈话，逝世后人们的评论等亦作概括综述，作为注加在他与朱绣谈话之后，作为本书60年来大事的结束。文内（ ）号内文字，系著者所加，未予更动，标明“原注”以存原貌；清朝及民国纪年之后，为

便于查考，皆于（ ）号内加上公历，个别地方则加校注者按予以说明，其属于藏历或农历者，尽量查清楚注明；错讹字及前后不一者用〔 〕号校注正字，缺文用【 】号补添脱字；□号为缺文或原文模糊看不清的字；明显衍字及一些显系排错的字，分别径予订正，未再一一注明。

由于经验不足和水平有限，校注中会存在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佛头著秽，诚惶诚恐，敬希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校注者 吴 均

1994年12月于青海师范大学